

朝鮮時代嶺南家訓研究芻議^{*}

盧鳴東

提 要

對於韓國境外學者來說,“嶺南”是慶尚道的別稱,也許不曾發現它在朝鮮時代的文教地位。朝鮮知識分子把嶺南稱為“鄒魯之鄉”,反映當地具備儒家文化發源的條件,與嶺南家訓的大量出現,關係密切。本文分析嶺南家訓採用的文體,發現其多樣化的書寫形式,包含箴銘、書信、詩歌和雜文等;在其題材內容上,揭示儒家經典知識的重新建構過程;從它在鄉村社會裏的流通情況,勾勒嶺南儒學世家在家訓形成上的貢獻。在嶺南當地,家訓不但起到訓戒家人和族人的教育功能,兼能實現古聖賢傳經濟世的宏願。

關鍵詞: 嶺南 嶺南家訓 儒家經典知識 家訓文體 儒學世家

一、緒 言

中國早期具規模而有代表性的家訓著述,首推北齊顏之推(531—591)的《顏氏家訓》,此書的內容和體例為後來家訓樹立典範,甚具開創意義。比較來說,相當於中國明、清之際,韓國家訓在朝鮮時代(1392—1910)的中、後期才大

* 本文由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優配研究金資助。計劃名稱:“儒學教育與朝鮮王朝嶺南家訓的形成”,項目編號:12603519,謹此致謝。

量出現,其中以嶺南地區占大多數。1993年,韓國學者徐守鏞編輯的《嶺南의 家訓》,¹專門收錄朝鮮王朝嶺南地區出版的家訓著述,反映近年韓國學者已留意嶺南家訓研究。朝鮮王朝把全國分爲八道行政區,分別是平安道、咸鏡道、黃海道、京畿道、江原道、忠清道、慶尚道和全羅道。當中,慶尚道稱爲“嶺南”。徐守鏞記錄嶺南家訓作者多達139位,至今學界熟悉的,有金宗直(1431—1493)、李滉(1501—1570)和柳成龍(1542—1607)等朝鮮大儒,其他絕大部分的都不曾受學界關注。從徐氏輯錄中所見,嶺南家訓數量豐碩,共有296篇,主要以單篇短文爲主;內容多徵引中國典籍,並與儒家文化關係密切,例如爲學修身、家庭倫理、禮儀道德等項目都有融入使用。書寫形式與中國家訓文體類同,常見有箴言銘文、遺戒條例和家書詩文等。

整體而言,韓國境外學者對朝鮮家訓關注不多,而韓國學者對此亦研究不足。1984年,孫仁銖、李元浩編撰的《韓國人의 家訓》,屬於韓國古今家訓輯錄本,全書300餘頁,收錄家訓70種。²沈貞烈認爲朝鮮時代具代表性的家訓著述有28種,但至今受重視的只有柳希春《庭訓》、李惟泰《庭訓》、尹衡老《家訓》和李擎根《顧菴家訓》四門。³在研究對象上,韓國學者多以單一姓氏家訓著述爲主,例如尚州延安李氏《益峯家訓》,⁴鮮有區域性研究課題。在研究方法上,包括:(1)家訓內容分類;⁵(2)蒙書與家訓關係,如比較李珣《擊蒙要訣》、《聖學輯要》與尹衡老《家訓》;⁶(3)朱熹《文公家禮》與朝鮮家訓構成關係;⁷

1 徐守鏞:《嶺南의 家訓》(漢城:嶺南社,1993年)。

2 孫仁銖、李元浩:《韓國人의 家訓》(서울:文音社,1984年),頁322。

3 沈貞烈:《朝鮮時代家訓研究-眉巖·草廬·戒懼菴·顧菴을 중심으로》,公州大學漢文教育系博士論文,2011年。

4 鄭茂坤:《조선시대 家訓의 成立過程연구》,《藏書閣》第15輯,2006年6月,頁71—95。

5 鄭茂坤:《朝鮮時代家訓書的分類體例檢討》,《韓國教育史學》第29卷第2號,2007年10月,頁163—186。

6 鄭茂坤:《朝鮮時代家訓書與教材的相互影響研究》,《教育哲學》第41輯(2008年2月),頁251—269。禹英姬:《朝鮮時代教訓書를 통해 본 子女養育—童蒙先習、擊蒙要訣、士小節、顧菴家訓을 中心으로》。中央大學校大學院,家政學科兒童學 및 家族關係專攻,博士學位論文,1989年。

7 南惠美:《17世紀 士大夫 家訓을 통해 본 家禮—草廬 李惟泰(1607—1684)의 庭訓을 중심으로》,《東洋古典研究》第24輯(2006年6月),頁223—255。

(4) 家訓詩文體；⁸ (5) 家訓與朝鮮士人家庭教育，如丁若鏞、⁹ 柳希春、李惟泰、尹衡老和李擎根。¹⁰ (6) 朝鮮家訓概述。¹¹ 可見，韓國學者對朝鮮家訓研究雖已取得一定成果，但當中仍然遺留不少討論空間，可作進一步思考。

地理空間是文化傳播的必然元素，環境越是理想，文化播遷能力越大，被影響的幅員越廣，而受熏陶的人數也越多。朝鮮家訓在嶺南地區所以大量產生，與其文化淵源關係密切。在統一新羅時代，嶺南慶州府是國都選址，之後亦成為高麗王朝的東京所在。當地久經華夏典章浸淫，禮樂文物齊備，蘊藏豐厚的儒家文化資源。新羅神文王二年（682），慶州府設“立國學，置卿一人以掌之”；景德王六年（747），國學置“諸業博士，助教”，教授儒家經典。¹² 深厚的儒家文化積累，奠定慶州府及其周邊地區的文化基礎，也鼓動當地士人展開及參與儒家文化活動。除了地理優勢的文化誘因外，朝鮮知識分子普遍相信朝鮮半島的文教地位，可比擬華夏，已躋身成為文教禮義之邦。在這種文化意識的帶動下，嶺南家族羣體通過撰寫家訓，彰顯自身、家族以及國家民族所抱持的儒家價值觀，藉此體現在文化身份上的一種華夏特質。

家訓是一個家族或家庭的教誨，是提供家人或族人集體遵守的家戒規約，早期主要以單篇形式寫成，到後來逐步發展成為具規模的著述。本文闡釋嶺南享有特殊文教地位的成因，之後分析當地家訓的書寫形式，以及嶺南士人如何把東傳的儒家經典知識重新建構，創造屬於朝鮮本土的家訓文獻。此外，嶺南家族羣體盤踞一地，累世經營，枝葉繁衍，對當地家訓的形成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例如安東府權氏是嶺南儒學世家，其家族成員撰寫過很多篇家訓著

8 金英珠：《麗末鮮初家訓類詩文中顯現的家庭教育》，《東方漢文學》第 55 輯（2013 年 6 月），頁 59—90。

9 朴均燮：《家庭教育的範圍與指向——以丁若鏞的家訓為中心》，《教育哲學》第 41 輯（2010 年 8 月），頁 93—120。

10 沈貞烈：《朝鮮時代家訓研究——眉巖·草廬·戒懼菴·顧菴을 중심으로》。

11 鄭求福：《古文書를 통한家訓연구》，《精神文化研究》第 19 卷第 3 號（1996 年 9 月），頁 171—199。

12 《增補文獻備考·學校考一》記載：“新羅學制以《周易》、《尚書》、《毛詩》、《禮記》、《春秋左氏傳》、《文選》分而為之業，博士若助教一人；或以《禮記》、《周易》、《論語》、《孝經》；或以《春秋左傳》、《毛詩》、《論語》、《孝經》；或以《尚書》、《論語》、《孝經》、《文選》，教授之。”洪鳳漢編：《東國文獻備考》（漢城：明文堂，1981 年），冊下，頁 353。

述,各篇旨意相關,能反映出嶺南一地的家訓特色。

二、嶺南地區的文教地位

文化身分的認同,與文化傳播空間的形成,關係密切。朝鮮知識分子深信自箕子東來傳教,頒授八條以後,朝鮮半島已達到華夏文教水平,屬於“禮義之邦”,朝鮮民族也因此有著華夏身分。¹³ 他們爲了引證自身民族在華夏文教上的優良傳統,於是在國家版圖上尋找適合的文化區域,充當國內儒家文化的起源地。朝鮮時代的嶺南被視爲“東國鄒魯”,當地的文化屬性亦因此開始形成。基於華夏身分的自我約定,促使儒家文化在朝鮮社會裏廣泛傳播,特別在嶺南士人的心目中,對儒家文化的承襲使用,便成爲了他們帶有普及性的自覺行爲。

朝鮮知識分子認爲儒家文化在國內已經傳播千載,禮義文教等同中國,所以,朝鮮民族不能被視爲夷狄。柳夢寅(1559—1623)曰:“我國禮樂之盛,正爲東國之成周,而中國之待我士子,反不如新羅、高麗時。”¹⁴ 中、朝之間需要維持互相尊重的關係,大凡把朝鮮民族看成爲夷狄,他們皆不以爲然。趙綱(1586—1669)曰:“以待夷狄之道待華人,以待華人之道待夷狄,名分之乖舛如此,深恐天下之人將以夷虜之道向我東國也。”¹⁵ 他們認爲朝鮮的政治文教效法堯舜、周文,因此,其民族性與此相同。金宇顥(1540—1603)曰:“若能留意帝王之學,獨得於舜、文之心法,而行其導率之政,則東國之民之性,亦舜、文之民

13 自16世紀開始,這種文化意識在朝鮮士人階層中傳播迅速,有很大影響力。崔嵬(1539—1612)曰:“然箕子之治朝鮮也,所設八條之約,爲稍可以用夏變夷而已。”《簡易集·洪範學記》,冊49,頁513。趙綱(1586—1669)曰:“吾東在三韓之前,亦一東夷也,自殷師一受周封,教民禮樂,釀成中國之風。”《龍洲先生遺稿·東槎錄·重答林道春書》,冊90,頁415。韓元震(1682—1751)曰:“自箕子東來,八條敷教,用夏變夷,自是而稱‘禮義之邦’矣。”《南塘集·經筵說下》,冊201,頁134。李種徽(1731—1797)曰:“箕子東來,大革九夷之俗,而爲八條之教,禮在其中矣。箕子世衰而四郡二府之際,猶有仁賢之化,華人稱之爲‘君子國’。”《修山集·高麗史志》,冊247,頁573。成海應(1760—1839)曰:“箕子東出,設八條之教,當周之時而東國文明之治已洋洋矣。”《研經齋全集·道峯記》,冊273,頁328。載韓國文集叢刊委員會編:《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漢城:民族文化推進會,2003年)。

14 柳夢寅:《於于集·送朴說之赴京序》,《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冊63,頁359。

15 趙綱:《龍洲遺稿·玉堂時斥和筭》,《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冊90,頁91。

之性，未嘗少異。”¹⁶丁若鏞(1762—1836)強調華夷之分在於文教政治，不在乎疆土劃界。他在《與猶堂全書·拓跋魏論》中曰：

聖人之法，以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以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與夷狄，在其道與政，不在乎疆域也。¹⁷

韓國學者吳錫源認為丁若鏞的言論：“與其說茶山在服從中華主義的世界觀，毋寧說他在試圖糾正以前只是從政治、民族或者地理的角度來區分華夷的錯誤觀念，正確把握華夷思想的本質。”¹⁸朝鮮知識分子重新審視華夷本身的區別，已明確地指出國力強弱、民族差異和地理分野已不再是決定因素，儒家文教水平才是關鍵。丁若鏞曰：“即所謂中國者，何以稱焉？有堯、舜、禹、湯之治之謂‘中國’，有孔、顏、思、孟之學之謂‘中國’。今所以謂中國者何存焉？若聖人之治、聖人之學，東國既得而移之矣，復何必求諸遠哉！”¹⁹他認為中國聖賢之學已傳入朝鮮半島，之後華夏文明不必來自中國，儒家文化自然能夠在朝鮮國內發生。

當清人入主華夏中原，漢人政權再度失落在外族手裏後，一些朝鮮知識分子甚至認為，中國已喪失華夏文教的領導地位。申佐模(1799—1877)曰：“中國非舊日中國也，衣冠文物不可復見。”²⁰18世紀當時，他們認為禮樂文教獨存於朝鮮半島。李德懋(1741—1793)曰：

顧今六合之內，渾為戎夷，薙髮左衽，無一乾淨地。獨我東尚禮義而冠帶之，於今覺幸生東國也。²¹

16 金字顯：《東岡集·經筵講義》，《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冊15，頁193。

17 丁若鏞：《與猶堂全書·拓跋魏論》，《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冊281，頁253。

18 吳錫原著，邢麗菊、趙甜甜譯：《韓國儒學的義理思想》（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頁27。

19 丁若鏞：《與猶堂全書·送韓校理使燕序》，《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冊281，頁280。

20 申佐模：《澹人集·送柳相國洛坡赴燕序》，《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冊309，頁508。

21 李德懋：《青莊館全書·記福建人黃森問答》，《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冊257，頁70。

金履安(1722—1791)曰：

古者以地辨華夷……今也戎狄入中國，中國之民，君其君，俗其俗，婚嫁相媾，種類相化，於是地不足辨之而論其人也。然則當今之世，不歸我中華而誰也。²²

隨著清人掌管中國，華夷混雜一處，華夏禮義正宗變得模糊，中國再不能以地理為限，區分華夷。相對來說，自箕子傳教以來，朝鮮半島禮教大盛，足以師法，在文化水平而言，能以“中華”自居。但這個說法的合理性，除了因為在華夏政局劇變中，朝鮮政權免於旁落在夷人手中，得以延續“禮義之邦”的傳統外，朝鮮知識份子還需要提供證據，顯示他們確實具有禮義文教的傳承脈絡，一個相當於中國鄒魯的儒家文化發源地。

在八道地方行政區中，朝鮮知識分子把慶尚道（即嶺南），視為“東國鄒魯”：一個屬於朝鮮本土儒家文化起源的區域。參見下說：

(1) 趙綱(1586—1669)曰：“嶺南，東國鄒魯也。”²³

(2) 洪良浩(1724—1802)：“嶺之南，山皆雄峻明秀，土厚而水清，其俗敦實好學，無外慕，名儒碩士，磊落相望，號稱‘東方之鄒魯’嘗言曰：‘東國文明之氣，聚於嶺南’”²⁴

(3) 丁若鏞(1762—1836)曰：“嶺南，東國之鄒魯也。”²⁵

(4) 李是遠(1789—1866)：“嶺南文學，東國之鄒魯也。”²⁶

嶺南在八道之中所以被視為“鄒魯之鄉”，不純粹是出自朝鮮士人的主觀共識。在客觀環境上，嶺南的文化物質基礎，足以享有儒家文化中心的稱號。歸納來

²² 金履安：《三山齋集·華夷辨下》，《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冊238，頁503。

²³ 趙綱：《龍洲遺稿·誅金大司諫應祖文》，《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冊90，頁214。

²⁴ 洪良浩：《耳溪集·文會齋記》，《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冊241，頁204。

²⁵ 丁若鏞：《與猶堂全書·曹台瑞墓表》，《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冊281，頁360。

²⁶ 李是遠：《沙磯集·史補略序》，《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冊302，頁137。

說，(1) 儒學淵源深厚：李浚慶(1499—1572)曰：“八道中，忠清、慶尚、全羅三道，地廣物衆，州郡雄巨，最爲富庶，俗尚詩、書、禮讓，其中慶尚道，號爲‘嶺南’，風俗之美，道學之士，比諸道倍多。”²⁷(2) 經濟生產理想：李珥(1536—1584)曰：“我國諸道，土地之廣，物力之盛，無如‘下三道’。”²⁸(3) 人才輩出：徐居正(1420—1492)曰：“蓋慶尚一道，新羅氏之故國……實我國財賦之聚，人材之藪猶中國之資江南也。”²⁹(4) 文獻之鄉：成大中(1732—1809)曰：“夫嶺南，文獻之鄉也。”³⁰南方“下三道”，包括慶尚道、全羅道和忠清道，三道農產業發達，遠勝北方諸道，適宜水田耕種，人口凝聚力強。其中，慶尚道是新羅國的根據地，唐太宗稱之爲“君子之國”，³¹而慶州府更是新羅故都。由於嶺南地區有著深厚的儒家文化背景，兼且人才薈萃，藏書豐富，種種因素都有助當地儒家文化孕育成長。因此，在主觀意識和客觀條件上，嶺南都是朝鮮儒家文化起源的理想地方，而長久以來，它在八道之中一直肩負儒家文化播遷的重要角色。

三、嶺南家訓的書寫形式

“家訓”是訓示和勸戒家人或族人的文獻統稱。在嶺南家訓中，常見的名稱有“銘”、“戒”、“箴”，另有包括含有勸勉訓戒的家書、詩歌和雜文。《嶺南四家訓》收錄嶺南家訓 296 篇，分爲六種書寫形式：(1) 銘(5 篇)，如金士元(1539—1601)《晚翠堂左右銘》。(2) 戒(11 篇)，如金係行(1431—1517)《疾革遺戒》、金佺(1597—1638)《遺戒五事》、權得鍾(1788—1860)《諸孫遺誡》。(3) 箴(11 篇)，如金光粹(1468—1563)《警心箴》、李彥迪(1491—1553)《自新箴》、權好文(1532—1587)《家箴》。(4) 家書(116 篇)，如權柱(1457—1505)

²⁷ 李浚慶：《錄遺許太史國朝鮮風俗》，《東臯遺稿》，《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冊 28，頁 347。

²⁸ 李珥：《栗谷全書》，《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冊 44，頁 111。

²⁹ 徐居正：《送兵曹參判朴公樾出爲慶尚道觀察使詩序》，《四佳集》，《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冊 11，頁 261。

³⁰ 成大中：《贈軍威使君俞汝成》，《青城集》，《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冊 248，頁 431。

³¹ 金富軾著，李丙壽校勘：《三國史記》（漢城：乙酉文化社，1984 年）。卷四十一，頁 433。

《與子書》、金宗直《答綴書》、柳成龍《寄子衿》。(5) 詩歌(35首),如權紀(1546—1624)《勸孫兒等讀書》、金圻(1547—1603)《勉學詩》、金是柱(1575—1617)《臨歿訓戒詩》。(6) 雜文(118),如李滉《勸學文》、金大賢(1553—1602)《悠然堂家訓》、徐聖壽《家誠十二條》等。

“銘”是鑄刻在器物、石碑或木板上的格言,主要用來警戒自己或讚頌別人生平的文字。舉例來說,金士元撰寫的《晚翠堂左右銘》,共三句,每句三字。此篇記錄三個格言:“慎言行”、“勤讀書”、“務農桑”。³² 從其行狀中所見,這三句格言也是他生平的座右銘。《晚翠堂金公行狀》記載:“公歎曰:‘士子處世,不可非義干祿。惟盡力於本分,為庶幾寡過。況慎言行、勤讀書、務農桑三事,我師教之所存,敢不勉乎。’”³³ 他常警惕自己,言行謹慎,勤奮好學,重視耕種養蠶。另外,金係行在宗室廳堂所懸掛的兩塊木匾,分別刻上“吾家無寶物 寶物惟清白”及“持身謹慎 待人忠厚”的遺訓,³⁴ 藉此使自己和家人時時瞻仰,銘記於心。至今在嶺南的宗宅廳堂中,亦能經常看到刻有銘言的木匾懸掛在橫樑上。

“戒”有勸戒、禁止的意思。在嶺南家訓中常稱“遺戒”、“遺訓”、“遺命”,它主要是長輩在臨終前提示家人需要遵循的言行規範,也有囑咐親人辦理其身後事的方式。這些“遺戒”一般是臨終者的口語敘述,之後由親人或後人記錄成語錄體。金係行享年 87 歲,卒於朝鮮中宗 12 年(1517)12 月 15 日,他在臨終前召集子姪、從孫三塘公金瑛(1475—1528)前赴宗宅,叮囑親人在其死後,只許在墓前石碑上刻有其姓名,不得虛辭表彰功德。《寶白堂實記·疾革遺戒》記載:

召子姪及從孫三塘公瑛坐,而戒之曰:“家傳清白,世守恭謹,孝友敦睦,尤為先訓所重。汝曹一一遵守,勿以驕恣薄行,墜毀家聲。喪祭惟在誠敬,勿務為豐侈,且吾久在經幄,不得匡君救時,生既無益於世,死當薄

32 徐守鏞編:《嶺南의 家訓》,頁 117。

33 李象靖:《晚翠堂金公行狀》,《大山集》,《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冊 227,頁 454。

34 徐守鏞編:《嶺南의 家訓》,頁 22—24。

葬，但記姓名，以表幽墟。切勿虛辭溢美，請人爲碑碣，無善事而得善名，吾所深恥也。仍誦寶物惟清白之句，以詔之。”³⁵

金係行總結個人生活經驗，臨終前告戒親人處事須以清白爲鑒。他 17 歲生員試合格，之後文科及第，歷任司憲府監察、高靈縣監、弘文館副修撰兼知制、正言、獻納、司諫和大司諫等官職，熟悉官場明哲保身之道。燕山君三年（1497），“是時公已六十八矣。自以年至當休致，不復有意於世，潛心經籍，勉勵後進。”³⁶他辭官後一年，朝中發生“戊午史禍”，燕山君把金宗直門人金駟孫等嶺南士人判罪，處斬或流放遠地。因此，金係行置匾額於廳堂，命名“寶白堂”，據此爲鑒。他還訓誡鄉人和子孫曰：“汝輩連占科名，亦云：‘幸矣。’鄉人或稱吾福厚，而吾則只增盛滿之懼。”³⁷他向家人指出官場顯達爲禍患肇端，平生必須秉持清白，才能全身遠害。

從以上所見，嶺南家訓具有深厚的家庭教育功能，這在箴言中也甚爲明顯。“箴”有規戒和勸諫的意思，含有針對性的議題。例如，權益昌（1562—1645）《進德箴》，四字一句，全篇十七句，專用來訓勉個人德行。金道和（1825—1912）《家誡十箴·示孫兒獻周及諸孫》，篇幅較長，分類細緻，以“事父母”、“友兄弟”、“謹夫婦”、“奉祭祀”、“睦宗族”、“待賓客”、“御僮僕”、“謹租稅”、“慎交游”、“節嗜欲”爲題，分作十個條目。每條二十句，每句四字，全篇 800 字。金道和曰：“右十箴者，日用彝倫之節也。”³⁸說明它們是用來教育子孫的人倫規範。

在箴言中，嶺南家訓作者常採用分條撰寫同一主題。李衡祥（1653—1733）的《入學七箴》是專門教授學習經史的方法，是爲了回答後學張後俊的請教而寫成。李氏曰：“將以求志也。余嘉甚，作《入學七箴》”³⁹此篇分作七條，結構完整，每條十四句，每句四字。文中首以“講讀”爲題，勸告士人學習經史

35 徐守鏞編：《嶺南의 家訓》，頁 22。

36 李栽：《寶白堂金先生行狀》，《密菴集》，《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冊 173，頁 386。

37 徐守鏞編：《嶺南의 家訓》，頁 22。

38 同上注，頁 171、421—427。

39 李衡祥：《箴》，《瓶窩集》，《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冊 164，頁 255。

必須依照次序,曰:“凡爲學業,厥由講讀,苟不循序,何以有得?”⁴⁰之後,根據每部或每類經史的閱讀次序,確立六個條目。朱熹《小學》是童蒙學習基礎,故以“小學”爲開首,定爲“修身大法”,士人必須“誦之於口”,使“腳跟已牢,根基亦厚”,然後依照學習順序,列出“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六經”和“子史”的另外五個條目。在“六經”條目中,李衡祥說明士人在熟諳“四書”後,才可誦讀“六經”:

“四書”已熟,始入“六經”。樂可以和;詩可以興;節文於禮;政事于書;褒誅義意;卦象緒餘。隨量探討,資以先後。譬猶飲食,鹹淡惟口,照顧得到,體驗何有。⁴¹

李衡祥認爲“四書”、“六經”各具性質和功能,彼此講習方法不同。《大學》是“復性”之書,知行兼顧,故綱領條目,百覽不厭,然後“步步踐履,歷歷知行”;《論語》、《孟子》“一言半辭,寧不服膺”,故字字不得苟且;講習《中庸》,不得怠惰,因“一此不懈,聖賢可到”。⁴² 由此而言,“四書”必須熟透;至於“六經”,士人當根據自己需要,按照先後次序,適量攝取,探尋各經意旨,至體味深切,全面得到。

不但在箴言裏,嶺南“家書”也常見勸學的課題,一般是父輩勸教子輩的讀書方法。但與箴言不同,家書屬於親人私辭,故信中常帶有呵護關愛之辭,感情洋溢真摯。具鳳齡(1526—1586),綾城人,字景瑞,外號栢潭。他育有四子,長子忠胤、次子善胤、三子誠胤、四子命胤。《寄忠胤書》是具氏寄給長子的書函,訓戒他應該珍惜光陰,及時用功,避免後悔傷悲。書曰:“汝之虛歲月亦久,此須勉力百倍可也。青年易失,失則難追,白首無成,雖悔何及。汝非兒稚,念之及此。”⁴³具氏責子,用辭深切,盼望早日成材。《寄誠胤書》是他給三子的信,告

40 李衡祥:《箴言》,《瓶窩集》,《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冊164,頁263。

41 同上注,頁266。

42 同上注,頁264—5。

43 同上注,頁80。

戒其讀書要掌握篇章要領，借鑒古今，“推之於事，兼人已備體用”，使能學以致用。給四子的《寄命胤書》，訓斥其讀書需要專一，“汝之讀書，何不主一，而妄爲貪多也”，批評他閱讀朱熹《資治通鑑綱目》，不得要領，“與不讀何間？”⁴⁴嶺南是朝鮮士林集居淵藪，當地好學之風，充分體現在具氏家書之中。

除了勸學以外，家書圍繞家庭教育的每一細節，故議題每與生活起居息息相關。因具鳳齡長子媳婦有孕，於是他寫了一封信給兒子，教育養胎之法。《寄忠胤書》曰：

且聞汝妻有身云：“可喜可喜。”然而婦人妊子，不可輕易，必以禮處之可也。其在《小學》引《列女傳》之語，妊子之戒大概備矣。汝須以此章之語，翻譯書之，付于坐隅。汝妻日夜目存而心思，俾無違越，然後庶幾無負古訓，無踰禮則，而承家之重。繼世之長，亦有望矣。更須毋忽，幸甚幸甚。⁴⁵

胎教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內容，影響家族繼嗣與否，事關體統。具鳳齡勸勉忠胤，把《小學》中《列女傳》的一段翻譯爲譯文，置於妻子坐椅旁邊，讓她熟讀深思，安胎作息。《小學·立教第一》記載《列女傳》這一段文字：

《列女傳》曰：“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⁴⁶

劉向安胎之法，講求孕婦飲食言行端正，諸如夜寢平睡，坐立不偏，慎選食材，講究烹調刀工，禁止視聽紊亂心神的物象聲音。同時，孕婦入夜誦詩，勿生邪念，

44 李衡祥：《箴》，《瓶窩集》，《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冊 164，頁 81。

45 同上注，頁 80。

46 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年），冊 13，頁 295。

方能分娩順利,胎兒發育健康。通過家訓書信記載,中國典籍裏的生活知識在域外得到廣泛傳播,起到家庭教育的實際作用。

憑藉書寫文體的各種性質,家訓作者有效地達到勸戒目的。詩歌語言精練,富有節奏感,讀者依據音樂旋律美,反覆背誦,容易熟記。同時,詩體擅於感情表達,用作家訓,則親情意摯,骨肉關懷,躍然紙上。《嶺南家訓》收錄“家訓詩”³⁵首,除了柳成龍《書許魯齋詩》、《示子弟》兩首採用古體外,其他皆以近體寫成。五絕有權益昌(1562—1645)《自修》、許薰(1836—1907)《訓蒙二十五則》,共26首;七絕有權紀(1546—1624)《付孫兒養得從學檜谷》、《孫兒讀書檜谷》、《勸孫兒等讀書》、金圻(1547—1603)《勉學詩》、金學培(1628—1673)《遺戒詩》,共5首;五律和七律各1首,包括柳元之(1598—1674)《勸學》和金是柱(1575—1617)《臨歿訓戒詩》。

古詩格律不嚴究,句數不限。柳成龍《書許魯齋詩》:“萬般補養皆爲僞,只有操心是要規。”⁴⁷此詩取自許衡(1209—1281),僅兩句,每句七字,屬於早期嶺南地區的家訓詩。柳氏訓示弟子若善能養心,便能養身,並謂“此乃魯齋名言,汝輩終身體允可也。”到了朝鮮晚年,嶺南家訓詩已具規模,組織周密,結構完整,還出現了家訓組詩。許薰(1836—1907)《訓蒙二十五則》由25首詩組成,主要圍繞四個方面,包括立志好學(《志學》、《勤學》、《好讀書》、《作字》4首)、修身正心(《持敬》、《正心》、《求放心》、《窮理》、《身如器》5首)、家庭倫理(《孝》、《敬長》、《友兄弟》、《取友》4首)和飲食言行(《四宜》、《爲善》、《早起》、《長者言》、《行立坐》、《四莫》、《推仁》、《務實》、《重衣重》、《酒技》、《貴賤》、《禁南草》12首)等。各首句式相同,除了篇末《禁南草》是五律詩外,其餘24首都是五絕詩。每首詩都有明確題旨,內容獨立完整,但又聯繫著訓戒童蒙的主題。例如:

腕直筆亦直,心正字亦正。小畫如透堅,一點當存敬。《作字》

如欲其心正,必先正威儀。不有威儀正,其心易有私。《正心》

47 徐守鏞編:《嶺南家訓》,頁126。

螻蟻勿踐踏。草木勿摧折。推此不忍心。其亦爲仁術。《推仁》⁴⁸

以上三首詩題旨不同：《作字》教授小童執筆寫字技巧；《正心》訓戒個人常要保持莊嚴容止儀態；《推仁》倡導愛惜生命，儘管昆蟲草木，一一在乎。人們能操存本心，文字才寫得端正，與儀表外貌，表裏一致，據此推衍仁愛，踐履萬物生之道。詩歌雖取材各異，但又有著同一主題的連貫性。

由散文體撰寫的“雜文”家訓，篇幅較長，選材豐富。在嶺南家訓中，除了散文外，“雜文”也常用序、箋、疏等文體寫成，其中比較特別的有“條目”的書寫形式。“條目”採用分條立訓的方式，列舉細目，每條含有獨立題材，又互相聯繫，服務同一主題。例如，李滉《修身家訓》分爲 10 個條目，以“立志”、“敬身”、“治心”、“讀書”、“發言”、“制行”、“居家”、“接人”、“處事”和“應舉”爲題。⁴⁹此篇專門訓戒士人立志正心、待人接物、治學科業等方面。比較其他家訓的書寫形式，“雜文”有一個特色，是它經常用來記錄士人一日裏的生活規範。例如柳洛文(1766—1807)《日課》和金樂行(1708—1766)《日課》。柳洛文《日課》記載：

逐日蚤起，盥櫛正衣冠，上堂問安，退讀所業。食後問安于諸父母，灑掃房屋，常令潔淨無塵。幾案書冊，勿散亂頓放。不得無故出入隣里，毋招呼雜人，打話終日。常須整容端正，儼然如對神明。夜眠及疾病，則不可卧。言語必思而後發。勿與人戲謔語，侵人家長上。勿評論貨色，勿言人過失，及官政得失。勿詬詈僕隸。行步時，須張拱徐行。常置小冊子，筭記逐日所爲之事，及所見古語之要切者。雖麤細事務，來到面前，盡心力而爲之。夕食之，上堂安置，退讀所業。二更就寢，寢時，須齊手斂足。⁵⁰

48 徐守鏞編：《嶺南의 家訓》，頁 439、444—5。

49 同上注，頁 61—63。

50 同上注，頁 371。

歸納下來,柳氏訓戒家人包括三方面:一、時間規劃:晨光初現立即起床梳洗,整理衣冠,到堂前向父母問安,然後用功課業。日間午飯後向宗族長輩問好,之後打掃房室,收拾書桌,凡事專注盡心。黃昏晚飯後,繼續治學,至 11 時許就寢;睡時平卧,手足齊平。二、言語行爲:說話謹慎,多思考,儀表端莊,緩步有禮;禁絕品評美色,道人是非,議論朝政得失;不得與陌生人終日閒談,滋擾鄰舍,責難僕人。三、省察反思:常備筆記手冊,記錄日常要事,古語精義,不時反省。《日課》簡約易明,貼近人們生活,利於普及施行,在具體實用之餘,又不失教誨的意義。

四、嶺南家訓的形成及擴展

(一) 儒家經典知識重構

在朝鮮時代,不論是京城成均館、地方上的鄉校和書院,儒家經典都是課堂講學的依據。儘管經師在選材範圍、讀書目錄、講授次序,義理發明等,常有出入,但他們採用的教學文本都是以儒家經典為主。然而,家訓的情況不一樣。家訓是在儒家經典基礎上創造出來的“新生文本”,收錄的知識是經過重新建構,與原來經籍文本不同。所以有重構的需要,是由於課堂教學與家訓教育雖然都帶有教育性質,但施教目的卻有差異。課堂講學是學術知識的傳授,用作講授的經典文本,盡可能保持原來面貌。家訓取材以儒家經典為骨幹,而為了配合家人生活的實際需要,達至規勸、訓戒功能,一般會重新擬定主題,重構儒家經典知識。同時,家訓作者也會融入其他學說思想、人物典故、歷史故事,或與時局相關的題材,藉此增強家訓的說服力。這種具開放性的選材方式,致使家訓呈現出多元化的知識內涵。

現存的嶺南家訓遺留深刻的知識改造痕跡,這反映在材料的篩選和使用上,對中國經史知識兼容並蓄,尤其明顯。權好文(1532—1587)《家箴》是嶺南安東權氏家訓,寫成於 1584 年 4 月。此篇包括“夫婦之道”、“父子之道”、“兄弟之道”、“使奴婢”、“奉祭祀”、“睦族隣”等六個部份,說明了在“修、齊、治、

平”的治道關係上，五倫關係的重要性。⁵¹《家箴》各部敘述形式一致，先進行字詞解釋，次為引經據典，揭示思想內涵，然後徵引歷史故事，提供佐證。例如“夫婦之道”：

妻，齊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而從子。夫者，婦之天也。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齒。⁵²

夫婦倫常是五倫關係肇端，需先行扶正，使家庭和諧。《家箴》倡導從夫之義，先徵引《禮記·郊特牲》、許慎《說文解字》和班昭《女誡》，注解“妻”的意義。《說文解字》曰：“妻，婦與夫齊者也。”⁵³在結成夫婦後，雖丈夫身故，婦人從子，不得改嫁。同時，婦人依照丈夫爵位，坐席亦跟隨丈夫輩份安排。《禮記·郊特牲》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齒。”⁵⁴另外，《家箴》指丈夫為妻子之天，此說見於東漢班昭《女誡》：“《專心》第五：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⁵⁵《家箴》整合上述經典內容，闡明婦人需遵奉從夫之義，出嫁後不得違背婦道。

接著，《家箴》通過《周易》、《中庸》和《禮記》論證夫婦倫常的合理關係。《家箴》記載：

《易·家人》卦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

《小畜》卦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51 權氏在《家箴跋》中曰：“人稟五常，萬善具性，率性最切，方義直敬。身苟修矣，家齊無競。夫為妻綱，謹乃禁令。父當子教，指以作聖。兄友弟恭，慕善羶行。況使臧獲，敢不以正。慎終追遠，以全定命。睦族和隣，亦勤弔慶。噫！茲六道，行以究竟，苟充其行，可施國政。”《家箴》，《松巖集》，《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冊41，頁183。

52 徐守鏞編：《嶺南家訓》，頁91。

53 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頁259。

54 鄭玄注，賈公彥：《禮記注疏》，《十三經注疏分段標點》（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1年），冊11，頁1260。

55 班昭：《女誡》，《諸子集成補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冊2，頁42。

《中庸》曰：“君子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禮運》曰：“夫婦和，家之肥也。”⁵⁶

夫妻能嚴守內外名分，倫常便可端正。《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孔疏曰：“《家人》之道，必須女主於內，男主於外，然後家道乃立，今此卦六二柔而得位，是女正位乎內也，九五剛而得位，是男正位乎外也。”⁵⁷《家人》卦離下巽上，六二陰爻示明婦人正位在內；九五陽爻示明丈夫正位在外。六二爻與九五爻相合，夫婦名位得正，家道端正。相反，《小畜》曰：“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注曰：“已爲陽極，上爲陰長，畜於陰長，不能自復方之，夫妻反目之義也。”⁵⁸《小畜》卦乾下巽上，九三陽爻，六四陰爻。陽爻主丈夫，陰爻主妻子。今妻子在丈夫之上，封閉其行，從夫之義失常。經文調車輪直條脫落，故車子不能前進，象徵夫妻乖戾，反目不和。可見，夫婦倫常影響至巨。權氏續引《中庸》第12章，說明君子之道發乎夫妻倫常，需要貫達當中精微深奧之處，明辨天地內一切事物；另據《禮運》敘述夫妻和諧，是家人福祉所在。

在中國的歷史文獻記載過不少真實個案，可以提供古人實際的生活經驗，具體說明古代夫妻相處的關係。《家箴》根據中國史書，採用了六則史實，包括：(1) “相敬如賓”：據《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晉臣臼季夫婦以禮相待爲鑑，勸導夫妻相互尊敬。(2) “不棄糟糠妻”：據《後漢書》宋弘拒絕漢光武帝迎娶湖陽公主劉黃，及《資治通鑑·太宗紀》尉遲敬德婉謝唐太宗女兒婚事，訓戒丈夫貧富共患，不棄結髮妻子。權好文曰：“待妻之道，當法宋弘及敬德也。”⁵⁹(3) “失妻還爲夫婦”：據《後漢書》蜀郡太守黃昌妻子遇賊後淪落爲人妻，後來二人重拾夫妻名分；以及(4) “車載故妻”：據《漢書》會稽太守朱買臣接載故妻供給食物，倡言夫妻不忘恩義。權氏曰：“黃昌與買臣，不忘恩義如此，可

56 徐守鏞編：《嶺南斗家訓》，頁91。

57 王弼、韓康伯注，孔穎達正義：《周易正義》，《十三經注疏分段標點》，冊1，頁318—319。

58 同上注，頁125。

59 徐守鏞編：《嶺南斗家訓》，頁92。

謂賢君子也。”⁶⁰(5)“妻戒夫學”：據《後漢書》東漢樂羊子妻子斷織勸學；以及(6)“舉案齊眉”：據《後漢書》梁鴻妻子孟光舉起飯盤與丈夫眉毛等齊，訓教妻子相夫之道。權好文曰：“其相敬禮貌，爲人婦者，可不鑑哉！”⁶¹這些史實在中國歷史上千古傳誦，亦爲朝鮮士人熟悉，普遍流傳，故權好文摘用於《家箴》中，借古鑑今。

權好文拜李晃門下，深受老師賞識。洪汝河(1620—1674)在《行狀》中記載：“公才豪氣銳，汎濫百家，爲詩文，浩漾瞻麗。先生喜其爲人。”⁶²權氏擅於詩文，行文秀麗，可是，他沒有使用自己的文字書寫家訓，而是選用儒家經典文句，借鑒中國史實，寫成《家箴》。究其原因，無疑與經史中含有大量家庭教育材料有關，故可以直接抄錄。但更有可能是，權氏採用家訓的書寫形式，整合篩選經史原文，遂使行文集中，簡約易懂，兼能保持文本原貌，使儒家經典能透過另一種書寫形式廣泛傳播開來，有利普及。《行狀》記載：

[權好文]乃曰：“近世好禮，則膠於古，而不通於今。”乃因《禮》經，《家禮儀節》等書，酌古參今，抄成一帙，以授子姪。又著《家箴》，“奉祭祀”、“接隣里”、“御奴婢”，皆有節目，使訓習之。尤喜獎後學，雖閭里童稚，咸聚而教之。⁶³

《家箴》在寫成之前，權好文曾著手整理儒家典籍。他爲了使族人貫達古今禮儀，於是把《禮》經、丘濬(1421—1495)《家禮儀節》等禮書，抄成一部。禮籍卷帙浩繁，欲要實踐傳經目的，就只能按需要抄寫，不能完全輯錄。同樣地，《家箴》剪裁經史寫成，用途不限於訓戒家人，也用來教授鄉里童稚，由此不但擴闊家訓的施教羣體，也能展現經學濟世的關懷。

60 徐守鏞編：《嶺南家訓》，頁 92。

61 同上注，頁 93。

62 洪汝河：《行狀》，《松巖集》，《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冊 41，頁 190。

63 同上注。

依據家訓的性質和功能,儒家經典知識能徹底地滲入鄉土社會裏,通過親屬的傳播鏈,使家人和族人都能飽受儒家文化薰陶。在嶺南家訓中,倫理、修身、為學和生活起居這四方面,最具影響力。詳見下表:

表一 嶺南家訓中的儒家經典知識

	倫 理	修 身	為學	生 活 起 居
李滉《修身十訓》		立志 敬身 治心	讀書 應舉	發言 制行 居家 接人 處事
金光粹《警心箴》	事親 輔君 祭廟 正家 友愛	安貧		謹刑 廢讒 慎色 結友
金佖《遺戒五事》				墳墓 祠堂 祭祀 誌碣 遺稿
金學培《書贈兒輩》			讀書 勤學	晨起 朝後 言語 房室 接人 飲食 衣服
權舜經《無窩十誡》	父命 兄弟 尊長 毋壓卑下 護幼	心志		言語 盜竊 貪婪 女色
金道和《家誡十箴》	事父母 友兄弟 謹夫婦 奉祭祀 睦宗族			待賓客 御僮僕 謹租稅 慎交遊 節嗜欲
許薰《訓蒙二十五則》	孝 敬長 友兄弟 長者言 貴賤	志學 持敬 正心 求放心 四宜 窮理 身如器 推仁 務實 為善	勤學 好讀書 作字	重衣食 酒技 取友 早起 四莫 禁南草

上表所見,重構後的儒家經典知識通過家訓形式傳達,分置題目,立旨清晰明確,內容簡約易明,使家人和族人易於掌握,遵從實行。

(二) 嶺南儒學世家

家族是以血統聯繫而形成的親屬羣體,具有很强的凝聚力,族人聚居一

地，世代相傳，源遠流長。特別是一些儒學世家，他們紮根鄉土，學問世代相傳，對當地家訓的形成有著深遠的影響。嶺南“安東權氏”是一個具代表性的例子。他們的先祖在高麗高宗時在嶺南安東縣落地生根，之後經歷高麗、朝鮮兩朝，已越千載。在儒學的傳承上，安東權氏始由高麗權守平、權旦、權薄、權準、權廉、權適，後來發展至朝鮮時代的權近、權遇，各人皆科場登第，精通儒典。⁶⁴其中以權近（1352—1409）最為人熟悉，著述《五經淺見錄》，考訂《禮記》，至於精微。

儒學世家對家訓形成所起到的推動作用，不容忽視。地方族羣裏的家訓，最初只是家族成員的個人著述，發展到後來，逐步成為家族成員的羣體寫作活動。安東權氏是嶺南的世家大族，在這儒學世家裏藏有豐富的家訓文章。例如，權柱（1457—1505）《與子書》、權好文（1532—1587）《家箴》、權紀（1546—1624）《孫兒讀書檜谷》、權益昌（1562—1645）《進德箴》、權泰時（1635—1719）《示子致文》、權斗寅（1643—1719）《宗家新創記》、權斗經（1654—1725）《寄子暮》、權渠（1672—1749）《寄子晉》、權舜經（1676—1744）《無窩十誠》、權相一（1679—1759）《家範》、權萬（1688—1749）《寄子正容》、權得鍾（1788—1860）《諸孫遺誠》、權翰成（1811—1879）《示兒輩說》、權璉夏（1813—1896）《書耆耆兩孫書室》等。這些家訓不是一時之作，它們大約在 15 世紀至 19 世紀之間寫成。⁶⁵

家族家訓通常具有一定的聯繫性，反映家族成員在家訓傳統上所展現出來的一種共有價值觀。安東權氏受到程朱學說影響，在家訓內容上對“為學之道”存在相同觀點。下表歸納安東權氏訓戒族人的為學準則，包括“持心居敬”、“發憤用功”和“治學務農”三方面：

64 徐居正著，朝鮮史學會編：《新增東國輿地勝覽》（漢城：朝鮮史學會，1940 年），卷十八，頁 16。

65 徐居正編《安東權氏族譜》，記載了安東權氏家族先祖、父子兄弟和家人親屬的關係，這部族譜對於探討權氏家訓的形成，有相當重要的參考價值。據此可以進一步分析權氏在嶺南地區內的影響力。徐居正編：《安東權氏族譜》，朝鮮成宗 7 年（1476）木活字本，首爾大學奎章閣館藏，冊 3。

表二 安東權氏家訓的“爲學之道”

安東權氏家訓	爲學		
	持心居敬	發憤用功	治學務農
權柱《與子書》《與子礪書》		*	
權紀《勸孫兒等讀書》		*	
權益昌《自修》	*		
權斗經《寄子蕃》		*	
權渠《寄子晉》		*	
權舜經《名二子說》			*
權相一《家範》		*	*
權萬《寄子正容》	*		
權翰成《示兒輩說》	*		
權璉夏《書耆耆兩孫書室》	*	*	

* 爲家訓中所記載的相關內容

朱熹曰：“人只是要求放心。何者爲心？只是箇敬。人纔敬時，這心便在了。”⁶⁶讀書專一致志，勤於操持，若能居敬，則可存心。權益昌《自修》詩曰：“莫恨學難就，只求心一操。工夫知不遠，居敬是爲要。”⁶⁷詩中認爲治學不難，在乎操心恒常，時刻儼然，勤做工夫，不受物慾侵擾。在《寄子正容》中，權萬訓戒兒子曰：“但官家與私有異，飲食好，居處好，使喚足於前，一開口，小童輩並喉應答。又有高館遊觀之勝，聲妓絲竹之玩。凡可以壞人心術，而生驕逸怠惰之心者，不一而足……若不痛加檢攝，則決無向隅讀書之理，是可慮也。”⁶⁸安於逸樂，沉溺聲色，易生放縱懈怠之心，造成未能專心讀書。孟子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⁶⁹既要操持正心，也要有明確志向，不得輕浮無據，必須專務著實。《近思錄》曰：“伊川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

66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六，冊1，頁209。

67 徐守鏞編：《嶺南斗家訓》，頁171。

68 同上注，頁312。

69 趙岐注、孫奭疏：《孟子注疏》，《十三經注疏分段標點》，冊20，頁491。

是。有意近名，則是偽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⁷⁰權翰成在《示兒輩說》中教誨後輩，謂“至於持心處事之道，則曰‘務實’，曰‘從厚’，二者最爲重要的。”在《書耆耆兩孫書室》中，權璉夏囑咐兒孫不要搬弄藉口，埋怨“無暇讀書”，必須立定志向，知道“志苟立，雖事故焚集，豈無做工時日。”⁷¹誠如朱熹曰：“爲學在立志，不干氣稟強弱事。”⁷²

爲學講求持心立志，也要堅韌果敢，方有所成。朱熹曰：“今人做工夫，不肯便下手，皆是要等待。”⁷³權氏家訓勉勵子孫，不要安閒暇適，虛度光陰，年月晝夜，發憤用功，努力不懈。權璉夏訓勉兒孫：“讀書三冬，文史足用”；⁷⁴權柱謂兒子應“晝夜勤讀經書”，“毋虛度歲月”；⁷⁵權斗經指出“須閉門誦讀，愛惜寸陰”。⁷⁶光陰彈指，日常課業不能荒廢懈怠。但安東權氏亦注意到作息有時，不要熬夜，影響健康。權渠囑咐兒子謂“既棲山寺，課業尤當加意，然但夜讀，或過則易生病。且汝氣血素不足，不必至深夜，或腸虛，或氣腦，先罷就睡爲可，或定番數，讀了便止亦可。”⁷⁷權渠認爲兒子深居山寺，勤於課業，避免徹夜苦讀，傷害身體。他提醒兒子爲學要有節制，適度調整，臨事變通。

爲學與務農，性質不同；但在權氏家訓中，認爲彼此互涉。權舜經訓戒兒子，強調爲學與務農都是日常要務，不可偏廢。他在《名二子說》中曰：

人之日用，孝悌，其本也，而孝悌之暇，學與農，又急務也。悅童僕，務農桑，而節於用度，則先業可保，而得免於不孝。⁷⁸

孝順父母，友愛兄弟，是人倫根本所在，人子需終日持守。同時，人子能使僕人

70 朱熹編：《近思錄》，《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二，冊1，頁63。

71 徐守鏞編：《嶺南家訓》，頁416。

72 張伯行輯訂：《朱子語類輯略》，《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二，頁44。

73 同上注，頁45。

74 徐守鏞編：《嶺南家訓》，頁417。

75 同上注，頁26。

76 同上注，頁268。

77 同上注，頁291。

78 同上注，頁299。

心悅誠服,勤於農業生產,家人節用有度,便能保有祖業,遠承孝道。此外,權相一(1679—1759)在“家範”中曰:“讀書治農,爲居家節度,作《家範》,以是四字爲首。”⁷⁹其旨意大抵與權舜經相同。農業是帶有經濟效益的活動,是人們生活的基本需要。安東權氏這種具實用性的治學態度,用力程度雖然不及18世紀朴趾源(1737—1805)等北學派實學學者,⁸⁰卻反映朝鮮本土因素是研究嶺南家訓形成的一個重點。

五、結 語

本文開拓朝鮮時代家訓的區域性研究課題,是基於嶺南具有優越的地理文化條件。因朝鮮知識分子相信朝鮮半島的禮樂文化已達到華夏水平,故把嶺南確立爲“鄒魯之鄉”,視爲國內儒家文化的起源地。嶺南歷史文化深遠,保有優良的儒學傳統,兼且得到當地儒學世家推動,導致大量家訓湧現。嶺南家訓的書寫形式不拘一格,計有銘、箴、戒、詩、書、雜文等六種。每種文體各具特色,有獨立研究的價值。例如家訓組詩和雜文“日課”等,能反映家訓文體譜系的多樣性,以及其持續深化的主題內涵。在嶺南家訓的發展上,安東權氏付出了很大努力。從東傳的儒家經典中,他們重新建構儒家經典知識,創造出屬於朝鮮民族本身的教育文獻。權好問的《家箴》不只起到訓戒家人的作用,在鄉村社會裏也能發揮到普及的教化功能。可見,在家訓傳承脈絡之中,儒家經典知識通過家庭教育廣泛傳播,貫徹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的歷史,實現了古聖賢經世致用的宏旨。

限於文章篇幅關係,本文只採用徐守鏞編的《嶺南의 家訓》作爲研究材料,

79 徐守鏞編:《嶺南의 家訓》,頁302。

80 這些實學學者倡議“利用厚生”思想,主張效法清代生產技術,高談實學的必要性。[朝鮮]朴趾源在《燕巖集·原士》中曰:“講學論道,讀書之事也;孝悌忠信,講學之實也;禮樂刑政,講學之用也。讀書而不知實用者,非講學也。所貴乎講學者,爲其實用也。”又在《燕巖集·諸家總論》中曰:“然而士之學,實兼包農工賈之理,而三者之業,必皆待士而後成。夫所謂明農也,通商而惠工也,其所以明之通之惠之者,非士而誰也。”《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冊252,頁143、342。

此外記載在單行本和叢書文集中的家訓著述，需要進一步搜集，俾能揭示嶺南家訓全貌。例如《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韓國歷代文集叢書》和《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續編》，全面輯錄了朝鮮學者文集，數量龐大，其中在“雜文”、“書牘”和“系譜”的類目中，收錄了豐富的家訓材料。由於嶺南家訓有採用其他物質形式書寫，如有碑文拓本，也有懸板寫本或簡札本。這些材料便需要到嶺南遺址進行實物考察。

嶺南一帶除了是世家大族聚居之地外，也是朝鮮士人羣體安身之所。不少朝鮮宗儒辭官退隱，居處嶺南一地，辦學授徒，門人師承家法，撰寫家訓每帶有師承學風。近年韓國出版的《韓國經學家事典》，把朝鮮時代的儒家學脈分為“畿湖學派”和“嶺南學派”兩類。其中在嶺南師承脈絡上，“嶺南學脈”包括李滉淵源、李玄逸淵源、李象靖淵源等，共 9 門。⁸¹ 河謙鎮編纂的《東儒學案》，在“陶山門下諸儒學案”中記錄了李滉門人有趙穆、奇大升、金誠一、柳成龍、金柏巖、南致利、洪可臣、鄭士誠、金士元、柳仲淹、李德弘、曹好益，共 12 人。⁸² 其中，趙穆、金誠一、柳成龍、鄭士誠、金士元等嶺南士人，曾經撰寫家訓，學問有李滉的論學觀點。有鑑於此，分析嶺南地區師承脈絡，以及歸納門人家訓的各種編寫特色，相信是日後研究嶺南家訓的重要切入點。

（作者：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 教授）

81 崔錫起：《韓國經學家事典》（首爾：成均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所，1998 年），頁 531—535。

82 河謙鎮：《東儒學案》（晉州：一鵬精舍，1952 年），頁 153—187。

引用書目

一、中文

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

朱熹編：《近思錄》，《叢書集成初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吳錫源著，邢麗菊、趙甜甜譯：《韓國儒學的義理思想》。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年。

金富軾著，李丙壽校勘：《三國史記》。漢城：乙酉文化社，1984年。

河謙鎮：《東儒學案》。晉州：一鵬精舍，1952年。

洪鳳漢編：《東國文獻備考》。漢城：明文堂，1981年。

孫仁銖、李元浩：《韓國人의 家訓》。서울：文音社，1984年。

徐守鏞：《嶺南의 家訓》。漢城：嶺南社，1993年。

徐居正著，朝鮮史學會編：《新增東國輿地勝覽》。漢城：朝鮮史學會，1940年。

徐居正編：《安東權氏族譜》。朝鮮成宗7年木活字本，首爾大學奎章閣館藏。

班昭：《女誡》，《諸子集成補編》本。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

張伯行輯訂：《朱子語類輯略》。《叢書集成初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

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十三經注疏分段標點》。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1年。韓國文集叢刊委員會編：《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漢城：民族文化推進會，2003年。

二、韓文

(一) 專書

崔錫起：《韓國經學家事典》。首爾：成均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所，1998年。

(二) 論文

朴均燮：《家庭教育的範圍與指向——以丁若鏞的家訓為中心》，《教育哲學》，第41輯(2010年8月)，頁93—120。

沈貞烈:《朝鮮時代家訓研究——眉巖·草廬·戒懼菴·顧菴을 중심으로》,公州大學漢文教育系博士論文,2011年。

金英珠:《麗末鮮初家訓類詩文中顯現的家庭教育》,《東方漢文學》,第55輯(2013年6月),頁59—90。

禹英姬:《朝鮮時代教訓書を 통해 본 子女養育-童蒙先習、擊蒙要訣、士小節、顧菴家訓을 중심으로-》,中央大學校大學院,家政學科兒童學및家族關係專攻,博士學位論文,1989年。

南惠美:《17世紀 士大夫 家訓을 통해 본 家禮-草廬 李惟泰(1607—1684)의 訓을 중심으로》,《東洋古典研究》,第24輯(2006年6月),頁223—255。

鄭茂坤:《조선시대 家訓의 成立過程연구》,《藏書閣》,第15輯(2006年6月),頁71—95。

鄭茂坤:《朝鮮時代家訓書的分類體例檢討》,《韓國教育史學》,第29卷第2號(2007年10月),頁163—186。

鄭茂坤:《朝鮮時代家訓書與教材的相互影響研究》,《教育哲學》,第41輯(2008年2月),頁251—269。

鄭求福:《古文書を 통한 家訓 연구》,《精神文化研究》,第19卷第3號(1996年9月),頁171—199。

A Preliminary Study on Yeongnam Family Precepts in the Joseon Dynasty

Lo Ming Tu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Abstract

As Confucianism spread and matured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family precepts for Confucian education were developed in the Joseon dynasty (1392 – 1897). Initial statistics have yielded 296 family precepts dated from the Yeongnam area. They were penned by some 139 authors writing in different formats and genres, including letters, prose, verse, mottos, and inscriptions.

This paper is an exploration of the genres and construction of Yeongnam family precepts. It also analyzes how the content of Confucian classics served as foundations for family precepts that were intended to be handed down to later generations. This practice was an important boost for Confucianism to become a national value of the Korean people.

Keywords: Yeongnam, Yeongnam family precepts, knowledge of Confucian classics, precept genres, Confucian family